

# 长安佛教六大祖庭对日本奈良七大寺的影响 ——长安华严寺与奈良东大寺的发展脉络研究

曹铭婧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 唐代的长安成为佛教的学术中心, 至今流行的佛教八宗, 除天台、禅宗以外皆源于长安, 称长安佛教六大祖庭。当时的日本奈良形成了元兴、法隆、大安、兴福、药师与东西两大寺, 称奈良七大寺。归国的僧人多在这里活动, 产生了多数日本佛教的本山, 同时认定中国的寺庙为祖庭。日本的寺庙会先后有从属于多个宗派的遣唐僧回来, 因此文献里会对一所寺院有不同的宗派定义。本文从中日文献入手, 研究长安佛教宗派发源以及传入日本的脉络, 阐明长安祖庭与奈良本山之间联系, 梳理出了长安华严寺与奈良东大寺的传承脉络。

**关键词:** 长安 日本奈良 佛教宗派 发展脉络

**Abstract:** In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Chang'an became the academic center of the Buddhism; the Eight Schools of the Buddhism which are still popular in China, except for the Tiantai (Tendai) and Chan (Zen), all originated in Chang'an, the monasteries from which they were founded were called as the Six Founding Shrines of Buddhism in Chang'an. In Nara, Japan at the same time, the Gango-ji, Horyu-ji, Dai'an-ji, Kofuku-ji, Yakushi-ji, Todai-ji and Saidai-ji were founded, which were called as "the Seven Great Temples of Nara." The Buddhist monks returned from China usually gathered in these seven Buddhist temples to hold activities, where the *Honzan* (head temple) of most of the Buddhist schools of Japan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y all recognized the corresponding monasteries in China as the founding shrines. Each Buddhist temple in Japan might receive monks of different schools, and therefore in the historic literature, the same temple might be attributed to different schools. Started from the trimming of the historic literatures of China and Japan, this paper studied the originations of the Buddhist schools in Chang'an and the courses and procedures of their introduction into Japan,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ounding shrines in Chang'an and the head temples in Nara and made clear the diffusion course between the Huayan Temple in Chang'an and Todai-ji in Nara.

**Key words:** Chang'an; Nara (Japan); Schools of Buddhism; Development Procedure

## 一、中国的祖庭与日本的本山

### (一) 中国盛唐时期与日本奈良时代的关系

按照盛唐时期文学上一般指唐玄宗开元时期<sup>[1]</sup> (713~741), 史学上指从唐高宗到唐宪宗时代, 约公元8世纪上半叶到9世纪前页这一时期<sup>[2]</sup>。按照日本新版《大辞林》的注解, 这时日本正经历从飞鸟时代(约600~710), 经奈良时代(710~794)到平安时代(约公元8世纪末至12世纪末)的过程。

奈良时代因当时政权以奈良(平城京)为都得名, 此时日本积极效法唐朝建立了律令制社会, 在经济制度、艺术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学习唐朝, 国家保护下的佛教开始繁荣。

### (二) 中国佛教的祖庭与日本佛教的本山

众所周知, 中国佛教宗派的源头寺院称为祖庭。根据现存佛教八大宗派的祖庭与发展史来看, 笔者认为祖庭一般都是宗派祖师所在的寺院。祖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檀弓上》: “小敛於户内, 大敛

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本意是祭奠于祖庙之中庭，后被用指宗派发源，不限于佛教道教等也有祖庭一说。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的公认祖庭，而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分别有相应的八大祖庭，除天台宗、禅宗形成于江南外，华严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三论宗、密宗这六大宗派皆发源于长安，形成了长安佛教六大祖庭<sup>[3]</sup>。

在日本对于佛教的祖庭有“本山”“大本山”“总本山”“根本道场”等说法。根据岩波书店出版的《佛教辞典》以及三省堂出版的《大辞林》等的注解，“本山”被定义为宗派（学派）的起源，“大本山”“总本山”形容多个宗派（学派）的总源，以区别各分支的“本山”。而“根本道场”的意义更强调宗派（学派）的主要理论发源与传播场所。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分析，笔者认为日本的“本山”与“末寺”的体系在江户时代随着寺庙统治体系的建立而趋于完善。在受中国隋唐佛教影响最大的日本奈良时期，随着佛教宗派的形成也出现了七所由国家直接支持的寺院。按照建成定名年代排列分别为：元兴寺、法隆寺、大安寺、兴福寺、药师寺、东大寺与西大寺<sup>[4]</sup>。除法隆寺位于奈良郊区外都在奈良市区。因日本在政权迁都平安京（今天的京都）后，以南都之名称呼奈良。所以称南都七大寺。南都七大寺在日本佛教界有着极大的影响，大部分都成为宗派的本山。

## 二、长安的华严宗祖庭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早期传承法师有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等。初祖杜顺著有《华严法界观门》《华严五教止观》。日本大正年间成书的亚洲佛教经典著作《大正藏》，作为华严宗学的理论基础，收录了其观行方面的“无尽缘起”和判教方面的“五阶次等”，中日两国的僧人普遍追其为华严初祖。其灵骨塔在长安少陵原华严寺山坡上。随杜顺出家的智俨被尊为华严二祖，著有《华严经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华严五十要问答》，其灵骨也葬在长安华严寺<sup>[5]</sup>。近代华严宗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华严宗的实际创世人是三祖法藏<sup>[6]</sup>。

法藏是二祖智俨的徒弟，为康居后裔，曾参加玄奘译经，著有《六十华严疏》，同译《八十华严》等，他对《华严经》的解说和著述使得华严宗形成真

正的宗派。法藏曾被武则天赐号“贤首”，所以华严宗也称“贤首”宗。“法藏在神都洛阳从事活动，并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创立华严宗”<sup>[7]</sup>。并且他还曾为中宗、睿宗授戒，中宗为他建造了数所华严寺，其本人圆寂后也葬于长安少陵原华严寺东南。华严四祖澄观，在唐德宗时受封“清凉国师”，他的灵骨塔在初祖杜顺塔的右侧。五祖宗密师则是澄观的徒弟<sup>[8]</sup>。由于华严初祖杜顺、二祖智俨、三祖法藏、四祖澄观的灵塔均在长安少陵原华严寺，所以一般以长安华严寺为华严宗祖庭。

同时，周武灭法时期长安的僧人多在终南山聚集，形成了长安至相寺的前身。华严宗的早期高僧普安、彭渊、智正等长期在该寺讲经，圆寂后均葬于至相寺。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长安至相寺更具备祖庭条件”<sup>[9]</sup>。智正门下的高僧智俨（华严二祖）的徒弟新罗人义湘将华严宗传入新罗，称海东华严宗初祖。日本太平十二年（740）新罗僧人审详到日本宣讲华严教义，又传法于日本僧人良辨。

综上所述，如果从寺庙体系上分析，笔者认为应按照宋代华严宗僧侣净源（1011～1088）列出的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的发展顺序。而从佛学理论研究上来看，华严学的承传则是：慧光、道凭、灵裕、静渊、智正、智俨、法藏的顺序。在中日两国的佛教界，对于华严宗的传承描述中，除了与以上两种相近的表述，还有兼容两者的表述。但几种承传体系都与长安少陵原华严寺有直接关联。长安少陵原华严寺位于现今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塬半坡一片狭长开阔地上，据《长安志》记载，华严寺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受地形所限，在初建阶段没有高大殿堂建筑，而是依土塬地势掘窑洞以安置佛像和供僧众居住。根据《大正藏》、唐李忱的《幸华严寺》、李白的《杜陵绝句》、宋寇准的《游华严寺》等文献来看，华严寺兴盛时曾扩建了东阁法堂、会圣院、澄襟院、真如塔院等建筑，同时建有华严宗初祖杜顺坐定身骨的墓塔、二祖智俨塔、三祖贤首塔、四祖澄观塔，因清乾隆年间少陵原崩塌，现仅存华严宗初祖杜顺灵塔和四祖澄观灵塔两座砖塔。除华严宗五祖外，唐开元三大士、不空、智藏、玄逸等高僧都曾敕住华严寺。

## 三、奈良的华严宗本山东大寺

华严宗在日本属于八大宗派之一，在日本的开

山传播被认为最早是在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入唐学习,三年后邀请著名僧人道璇赴日本传戒。道璇在洛阳大福先寺(太原寺)出家后兼研律藏,师从禅北宗普寂,禀习禅旨、华严。他赴日带去了《华严经章疏》,东渡后先住大安寺西唐院,晚年退居吉野比苏寺。大安寺是奈良有名的南都七大寺之一,后来发展成为真言宗的寺院,而吉野比苏寺后来发展成为曹洞宗的寺院。道璇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渡日高僧,被日本佛学界公认为将华严宗传播到日本的僧人。

同时,日本公认的华严宗开山初祖是中国华严三祖法藏的新罗弟子审<sup>[10]</sup>。日本天平十二年(740),奈良金钟山寺<sup>[11]</sup>的良弁<sup>[12]</sup>邀请审详赴日本讲经。金钟寺在奈良大佛(毗卢遮那佛)的铸造时期<sup>[13]</sup>扩建成为由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资助的寺院“大和国分寺”,处于所有政府资助寺院的领导地位。在铸造大佛的监督机构的记录上,金钟寺被称为“东大寺”,这一名称沿用至今<sup>[14]</sup>。审祥跟随法藏学习了《华严经》六十卷本(东晋佛驮跋陀罗所译),以及八十卷本(唐实叉难陀所译)<sup>[15]</sup>。并且把这两种译本都传给了日本华严宗。随着日本天平十五年(743)圣武天皇大规模建立东大寺,并定为华严宗的中心道场,以及奈良大佛的竣工,东大寺派在良弁领导下培育了众多优秀的门徒,包括桓武天皇的国师等定。在日本大藏出版社1977年的《鎌田茂雄博士古稀記念華嚴學論集》中,讲等定之后日本华严宗的传承定为通进、长岁、道雄、基海、良绪的顺序。良绪之后的光智于日本天历元年(947),在东大寺建立了尊胜院为专修华严的道场。

东大寺是日本华严宗本源的说法是在日本镰仓时代由东大寺的著名僧人凝然(1240~1321)提出的。他所撰述的《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与同一时期宋朝天台宗僧人释志磐的《佛祖统记》被认为是最早的两部东亚佛教通史。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与《八宗纲要》《华严法界义镜》中记述了中日华严宗的传承历史,认定了东大寺作为日本华严宗本山的地位。同时,在日本实际上还有一处华严宗传播中心,就是京都高山寺。高山寺的创建者是法号高辨的明慧上人(1173~1232),他借鉴唐代李通玄、辽代觉苑等人的观点,创建了结合华严、密教以及日本固有宗教信仰的新华严宗,通称为“严密”,与东大寺派分庭抗礼<sup>[16]</sup>。最终由凝然的东大

寺一派争夺到了正统地位,而明惠的高山寺派则被定为旁门<sup>[17]</sup>。日本佛教界也习惯上把东大寺华严宗称为本寺派,将高山寺华严宗称为末寺派。

中日两国的学者都认为东大寺的壮大与当时日本的光明皇后敬仰唐代女皇武则天有直接联系,武则天在洛阳造大佛铜像以及在龙门奉先寺雕刻大佛石像的消息传至日本。在日本天平十二年(740),圣武天皇发愿“朕亦奉造”奈良大佛。日本天平胜宝四年(752)东大寺举行了盛大的大佛开眼法会,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与文武百官参列,万余名僧侣参加,由随审详一同渡日的天竺僧侣菩提任那执开眼笔(此笔现藏于正仓院)。公元753年,唐鉴真东渡日本,在大佛殿前向圣武太上皇等僧俗授戒。奈良时代,法相、三论、俱舍、成实、华严、律等六宗已传到日本,东大寺采取了六宗兼学,尤重华严的学术方向<sup>[18]</sup>。于南大门上高悬“恒说华严院”匾额。平安时代,除原有六宗外,天台、真言两宗也颇为盛行,东大寺标榜“八宗兼学”,由于鉴真带来的经典广为传播,华严宗与天台宗的研究关系密切。同时,从长安密宗祖庭青龙寺留学回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及其门下在南都奈良弘传真言密教,因此专研密教的学僧也聚居于此,建立了十余所子院,如空海创建的真言院、圣宝僧正(醍醐寺开山鼻祖理源大师)创建的三论真言兼学的东南院等。平安末期,因东大寺势力与权力巨大的平家势力在经营农庄方面产生摩擦。日本治承四年(1180),源赖政奉命举兵击败了东大寺、兴福寺、三井寺的僧兵,大佛殿被烧毁<sup>[19]</sup>。之后的东大寺首领俊乘房重源上人曾三次入宋,自61岁就任大劝进<sup>[20]</sup>一职,至建永元年(1206)去世,复兴了东大寺原有伽蓝的大半。之后由荣西(建仁寺开山鼻祖、日本茶道名家)、行勇两上人继承发展,到镰仓时代东大寺的华严宗振兴,其中宗性、凝然等高僧著作两千余册,至今流传。其后,日本战国时代的三好、松永之乱使大佛殿再次被烧毁,直至江户时代中期,日本元禄五年(1692)大佛修复,日本宝永六年(1709)新大佛殿落成。其后大佛殿虽经明治、昭和时代的大修规模变小,但仍是世界上梁柱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东大寺也是奈良南都七大寺中最大的寺院,号称日本华严宗总本山。至今在奈良东大寺的山门上悬挂的匾额还是“大华严寺”。



#### 四、中日华严宗发展脉络

中国佛教的宗派定义十分复杂，因为其中牵扯有形的寺院与无形的学派。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汤用彤认为：宗在历史上具有两重含义，即一指宗旨或主张，指称某种学说或学派；二指宗派或教派，指称有创始人、信徒、教义和教规的宗教团体。中国的宗派与日本的宗派产生的时期及其内容都不同，应该避免受日本学者有关宗派问题的论述（例如凝然的观点）的影响或误导<sup>[21]</sup>。

实际上直到宋代，中国佛教宗派才从学术团体过渡到真正的固定的组织集团。通常被称作“中国华严宗实际创建者”的法藏，主要是完善、汇总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华严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体系成为后来华严思想史的正统学说。“华严宗”一词最早见于澄观和宗密的著作<sup>[22]</sup>，宗密提出了杜顺、智俨和法藏三人的“华严三祖说”。之后，宋代净源提出“华严五祖说”作为宗派谱系。宋代，各佛教宗派都参考儒家的“道统”体系，完善了自身的传法谱系。这种“道统说”所确立的祖徒传承与真实的学说传承不一定重合。魏道儒在《中国华严宗通史》中就提出了“华严经学”和“华严宗学”两个概念以区分。同时在唐代，除法藏一脉之外，还有李通玄等华严学者，李通玄去世后，五代南唐政权曾将他的著作《新华严经论》编入《大藏经》。他的学说后来也辗转的转到日本并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学者小岛岱山曾提出了终南山与五台山两大华严派别并存的观点<sup>[23]</sup>，并根据著名高僧的活动区域，把杜顺、智俨和法藏划入终南山派，把灵辨（477～522）<sup>[24]</sup>、解脱（561年～642）<sup>[25]</sup>、李通玄和澄观等人划入五台山派。实际上在隋唐时期，长安地区是当时的佛教中心，既是智俨、法藏等人的活动地，又是华严学说的学术中心。在中国智俨、法藏的华严学始终被认为是正统派。日本的明惠与凝然所处的时代，本土化的新兴佛教派别——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以及从中国新引进的禅宗派别——临济宗、曹洞宗等相继出现，对传统的佛教派别，如天台宗和华严宗产生了冲击。通常把这两大阵营称为镰仓新佛教和镰仓旧佛教。明惠所处的时代中国北部的辽金、西北部的西夏、中原地区的宋，以及朝鲜半岛的高丽同日本之间的佛教典籍交流变得频繁，幼年学习法藏学说的明惠不但收集了辽和西夏的带有密教色彩的华

严文献之外，还得到了李通玄的著作。在李通玄的基础上，他创建了一种神学理论和宗教实践相结合的特殊观法——华严佛光观，以佛光观为依据，提出了异于东大寺派系的另一套法系。承袭东大寺派的凝然，则重视澄观的思想，接受了净源的五祖、七祖说，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十祖说。

#### 五、结语

佛教传入中国发展至唐代已十分兴盛，唐代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已开始超越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成为佛教学说的传播与发源中心。长安地区尤为代表，中原佛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各宗派学说的出现也通过朝鲜半岛或海路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奈良时代的日本佛教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在国家直接控制下。寺庙建于城市中，被称为“都市佛教”。此时期形成的奈良六宗起源，主要传人均均为留学僧或渡来僧，各宗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佛教宗派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其教相判释、教义戒法是从中国引进几乎不做变化。

虽然中国与日本的宗派划分基本还是以寺院（本山）为代表，以学说为判断标准，并且真正形成时期相差不远，中国成于宋代，日本成于之后中国明时期的江户时代。但因双方宗派皆将自身的系统倒溯至宗派学说起源的唐时代，因此产生了学术系统与实际承载学术的寺庙体系的区别，进而使得双方在宗派初祖以及祖庭方面的区别，尤其是日本的传统宗派往往向中国的祖庭溯院，因此产生了两国在对寺庙的一般介绍乃至专业文献上的脉络描述的差异。学术是佛教发展的根本，寺庙是僧侣信徒活动的载体，对于佛教宗派源流脉络的研究必须同时注重两者的发展与联系才能辨清。

#### 注释：

- [1] 林庚：《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 [2] 冯敏：《盛唐时期的史学研究》，《北方论丛》2014年第3期。
- [3] 张伯良：《汉传佛教在西安的祖庭和祖师（上）》，《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 [4] 何燕生：《日本的佛教宗派》，《法音》1992年第8期。
- [5] 游有维：《华严宗的起源、传承、演变与复兴（下）》，《法音》1986年第6期。
- [6] 华方田：《中国佛教宗派——华严宗》，《佛教文化》2005年第4期。

- [7] 郭绍林:《华严宗大师法藏洛阳事迹》,《丝绸之路》1993年第4期。
- [8] 董平:《论澄观对华严宗思想的发展》,《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
- [9] 陈景富:《为华严宗祖庭正名》,《文博》1997年第4期。
- [10] 王颂:《从日本华严宗的两大派别反观中国华严思想史》,《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 [11] 根据《续日本记》记载,日本神龟5年(728),因皇子菩提早逝,日本第45代天皇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在奈良若草山麓设僧房,成为金钟山寺之前身。“金钟”后来被解释为出自华严类经典《十住经》的“金钟香水”。
- [12] 良弁生于日本持统三年(689),是奈良东大寺的开山法师,因东大寺的前身是金钟寺,故也被称为金钟行者。日本在公元722年(养老六年)就有《八十华严经》的抄写本。到公元737年(天平八年)道璇带去华严宗的章疏。同年,良弁请新罗的学僧审祥,在日本讲解《华严经》,于金钟道场讲了《六十华严经》。之后在日本慢慢流行华严派。日本佛教华严宗的发展,良弁和审祥有重大的贡献。摘译自:稻垣晋清,《良弁僧正御伝記》,長谷川幾松(出版社),1909年。
- [13] 关漾纹,《巨大的铸铜佛像—日本奈良毘卢遮那佛像》,《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1984年第1期。
- [14] 西山厚(監修):《東大寺》(別冊太陽 日本のこころ)2010(09)。
- [15] 单欣:《〈华严经〉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5期。
- [16] 渡辺照宏:《日本の仏教》.岩波新書(出版社)平成二十六年七月。
- [17] 鎌田:《日本華嚴とはけめ正統と異端—鎌含旧仏教にはけり明恵と凝然》,《思想》,岩波書店,1959年。
- [18] 上山春平:《仏教の思想》第3巻,《空の論理“中観” 梶山雄一対話》,角川書店(出版:のち文庫)1969年1月。
- [19] 参考原文:“南都焼討(なんとやきうち)は、治承4年12月28日(1181年1月15日)に平清盛の命を受けた平重衡ら平氏軍が、東大寺・興福寺など奈良(南都)の仏教寺院を焼討にした事件。平氏政権に反抗的な態度を取り続けるこれらの寺社勢力に属する大衆(だいしゅ)の討伐を目的としており、治承・寿永の乱と呼ばれる一連の戦役の1つである。”。上杉和彦:《源平の争乱》,《吉川弘文館〈戦争の日本史6〉》2007年。
- [20] 在日本,“劝进”表示宣讲佛法、劝人行善的意思。以大劝进命名,表示寺院对世俗社会的最高指导。
- [21] 汤用彤:《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中华书局。
- [22] 澄观:《华严经疏》卷四十九(大正藏35、880、上),宗密:《圆觉经大疏》卷上之一(续藏14册、115左下)。
- [23] 小島:《中国華嚴思想再構築への試せ—中国華嚴思想史の二大潮流—》,《華嚴学研究》第三号、華嚴学研究所。和《新たもめ中国華嚴思想史—五台山系華嚴思想と終南山系華嚴思想—》,《華嚴学研究》第三号、華嚴学研究所。
- [24] 《华严经传记》记载:太原晋阳人灵辨幼年出家,倾心《华严》,携此经入五台山,求文殊菩萨佑助,于北魏熙平元年始撰释《华严》,于神龟三年撰成《华严论》一百卷。为五台山最早传习《华严经》高僧。
- [25] 《五台山旅游辞典》记载:解脱和尚(561~642),五台夹川人,俗姓邢。出家后曾到各地访名师,后定居佛光寺弘传《华严》近五十年,慕名听讲者达万人,跟他学成者也有千余人,是华严宗的先驱者和五台山佛教的开拓者。